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技术下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李 政 刘 涛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不断发展，零工经济再现生机，并呈现出新的特征。零工经济的复兴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下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工智能技术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和技术支持，也为更多元化的生产组织关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使得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有助于降低社会就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然而，这也为平台剥削零工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此外，由于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多被界定为独立承包商，零工经济的发展也为如何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和实现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再平衡功能带来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人工智能；零工经济；劳资关系；劳动者保障

作者简介：李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110036）；刘涛，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以创新为引领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研究”（22AZD032）；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有企业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研究”（22JJD790025）

DOI 编码：10.19941/j.cnki.CN31-1957/F.2025.01.002

一、人工智能技术下零工经济的兴起与社会效应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的“零工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短短数年间，以移动出行、外卖送餐、家政服务、众包服务等为代表的零工模式，已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兴力量。^①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2023）》，2022年中国零工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1 749亿元，预计2022—2024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保持在20%以上。其中，零工数字化平台是中国零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预计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35%，2025年有望突破1.6万亿元。相应地，灵活就业成为当下发展最快的就业形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突破2亿大关，其中网约车驾驶员309万人，快递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人，美团平台注册外卖员接近1 000万人，^②行业平台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也高达160万人。全球范围内，

① 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第5—14页。

② 魏国学：《灵活就业兴起的动因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2021年第8期，第22—30页。

零工经济同样不容忽视，世界银行有关研究显示，零工经济占全球劳动力市场的 12%，全球零工人数达 4.35 亿人。^①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零工经济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②为推进零工市场建设，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政府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20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发展新就业形态，支持灵活就业，加快完善相关劳动保障制度，引导企业推行用工余缺调剂机制，帮助有“共享用工”需求的企业精准、高效地匹配人力资源。2021 年 7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旨在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2023 年 12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通知》，对零工市场的服务定位、服务功能及运行模式等规范性建设给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意见。

毫无疑问，零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更是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在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缓解整体经济下行压力、提升市场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企业通过网络平台招聘零工，节省了传统招聘方式高昂的招聘成本；其次，企业可根据项目和任务灵活调整员工数量，降低用工成本；再次，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的零工经济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以低成本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激发了创新创业热情，提高了社会活力；^③最后，零工方式借助网络平台，极大地利用了社会资源，特别是为不方便外出的群体提供了远程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此外，零工经济还为三四线城市及偏远地区的求职者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对缓解大城市拥挤和抑制房价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④然而，零工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零工市场上多数劳动者面临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劳动者权益保障欠缺。虽然零工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灵活性，但这种工作形式本质上具有高度不稳定性，企业可以随时与劳动者解除合约且无须承担任何风险，劳动者权益难以得到维护。零工市场的合约模式多采用计件工资制，劳动者一旦出现疾病等意外情况，将失去收入来源，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精神压力和收入负担。此外，灵活用工模式使企业员工缺乏归属感，企业也缺乏为员工提供职业教育和培养的动力。由于零工经济扩大了员工个人能力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比重，因此还有扩大收入差距的趋势。

二、人工智能技术下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学理分析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生产力是指人类利用生产要素进行社会生产的能力，

① 赖德胜：《零工市场健康发展成全球课题》，《经济日报》2024 年 3 月 22 日，第 11 版。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1 版。

③ 马尔卡希：《零工经济——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陈桂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 3 页。

④ 杰夫·豪：《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牛文静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年，第 38 页。

体现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基础的要素，其互动规律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根本逻辑。^①马克思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因此，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必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催生新的生产关系。新时代以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带来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方式的革新，同时引发了生产关系的变迁，这是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客观条件。

（一）零工经济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现

作为一种生产关系，零工经济可以追溯至我国古代。随着奴隶制的消失，雇佣关系成为我国农业社会主要的生产关系，其中长工和短工是比较常见的雇佣形式。长工制指雇主与雇农之间长期、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短工制则指雇主与雇农之间临时性、不稳定的雇佣关系。短工制是零工经济的最早形态，适应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是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的产物。工业革命爆发后，工厂生产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主要形式，有组织的集体劳动逐渐取代了零工经济的主导地位，成为主要雇佣方式。在工业化初期，一些工厂出于成本考虑，聘用临时性、按件计酬的工人，这是工业化时期零工经济的主要模式。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企业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不断提高，需要对劳动者进行培训，为确保产品质量和劳动力供给的稳定，长期劳动合同成为主要的生产关系，而零工经济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以钟点工等低收入、低技能劳工群体为代表。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零工经济焕发新生，并呈现出新特征。

首先，零工经济向工业化生产渗透。随着科技变革的加速和社会需求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生产模式由规模化、标准化向个性化、定制化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亟须更加灵活的生产关系。在劳资关系方面，企业倾向于减少长期雇佣合约的劳动力，采用其他合约安排来满足非核心劳动力的需求。这方面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84 年英国管理学家 Atkinson 提出的“弹性企业”模型，该模型将企业劳动力按照从事业务的重要程度分为核心劳动力、一级边缘劳动力和二级边缘劳动力，分别采用长期合约、独立承包商和短期合同工或兼职工等合约方式。核心劳动力的使用追求功能弹性，边缘劳动力的使用追求数量弹性。^③

其次，平台成为零工经济中的核心要素。在传统经济时代，企业为应对季节性、周期性、时段性的生产需求，采用短期临时性的用工方式。虽然企业也通过劳务中介获取临时工，但核心矛盾仍存在于用工企业与劳动者之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平台成为连接劳动者与用人需求的主要媒介，劳动者不再经由劳动中介获取工作，而是直接通过数字平台接收用工订单。平台逐渐替代劳动中介成为劳动力交易的纽带。在经济层面，

①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社会科学文摘》2024 年第 5 期，第 94—9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13 页。

③ Atkinson J, “Manpower Strategies for Flexible Organisations”, in *Personnel Management*, 1984, Vol.16, No.8, pp.28—31.

这不仅使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参与到生产活动中，提高了社会生产率，还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更精准地匹配交易双方，并为合约执行提供技术性监督，降低了交易成本。然而，零工经济中的核心关系正逐渐从用工企业或个人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社会矛盾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再次，依托平台的零工经济重塑了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赋予劳动者更多工作自主权，形成了一种具有自我雇佣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者受到的资本显性约束减少，与资本方建立了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能够自由地选择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同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零工经济中，雇主提供生产资料，劳动者仅提供劳动力；而在新零工经济中，劳动者既是劳动力的提供者，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雇佣双方的关系更加类似于传统经济中产品市场上的买卖关系。例如，网约车服务是网约车司机利用其自身的驾驶技能和个人所有的劳动资料（即网约车），通过数字化网约车平台为乘客提供接送服务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通常情况下，网约车为劳动者个人所有或租赁，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拥有生产资料的新型“个体企业家”，但其在形式上仍然表现为自然人的社会劳动过程，即新就业形态。

最后，在零工经济下，资本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作为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体企业家”，劳动者对产品或服务拥有完全所有权，与产品或服务需求者之间是基于价值等量交换的平等关系，不存在剥削关系。作为零工经济的核心要素，数字平台虽不直接提供生产资料，但却是交易的关键媒介。数字平台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智能优化算法，实现零工经济供求双方的高效匹配。因此，在零工经济中，不再是生产资本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是平台资本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二）人工智能是推动零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新一代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整合了机械、通信、计算机等相关技术的创新成果，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与治理方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与运用催生了各领域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需求，成为提升社会生产力和推动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①

首先，人工智能推动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技术进步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早期人类为了战胜恶劣的生存条件，发明捕猎工具提升狩猎效率、发明纺车制衣提升御寒能力、发明犁车耕种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现代社会则发明各种机器，解放人类劳动，满足人类多样化需求，这些都是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典型例证。与此同时，巨大的技术变革也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长期来看，技术变革提高了就业水平，提升了劳动效率和劳动收益；短期来看，由于劳动需求结构的变化需要劳动者一定的适应和学习过程，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往往大于创造效应，巨大的技术进步也伴随着失业，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如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将人类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也导致大量手工劳动者失业，加剧了社会矛盾，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纺织工人砸毁纺织机器的“卢德运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电气时代，石油、化工、钢铁等产业的兴起，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小作坊逐渐消失，马车车夫、人力车夫、邮递员等众多传统职业逐步走向萎缩和消失；第三次工业革命将

^① 洪永森、史九领：《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学术月刊》2024年第1期，第43—59页。

人类带入信息时代，智能制造使得工厂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不断减少，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面对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不确定性，以零工为代表的多元化就业形式往往成为降低企业成本和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当今社会，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替代或部分替代人类脑力劳动成为必然趋势，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为社会创造的产业后备军，也是推动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的客观条件。

其次，人工智能让零工经济更好地发挥缓解产业周期性变动的功能。部分制造业季节性用工难以预测，需求旺季因人手不足而错失商机，而淡季则面临劳动力闲置和人力资本浪费。因此，灵活用工是帮助企业灵活配置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率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灵活用工能有效降低资源成本与投资风险，提升企业的创新创业热情。在传统经济中，利用劳动中介的劳务派遣模式或项目外包模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零工优势，但由于搜寻和匹配成本过高，一直难以成为主要的生产关系。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零工经济发挥优势提供了可能：一方面零工经济平台可以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智能优化算法进行自动管理，以低成本实现了高效率的大规模即时精确匹配和精细的计件分包，使按件计费在零工经济的大规模运行中成为可能；^①另一方面，零工经济平台通过获取和记录的劳动者的实时位置、在线时长、订单完成率和满意度等信息，监督劳动者的服务状态和服务质量，降低了用工企业或用户的监督成本。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降低了劳动服务费用，为用工企业和用户节省了大量成本，同时，高效的匹配能力也大幅提升了劳动者的服务频率和工作效率，对于劳动者而言，虽然单次工作的劳动价格降低，但总体收入却显著上升。据出租车司机反映，使用滴滴等打车软件比不使用打车软件能提升 20%~30% 的整体收入。

最后，人工智能助推零工经济成为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在需求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多样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在产品方面，消费者不仅注重功能性，还对工艺性提出了个性化要求；在服务领域，除了家政、培训等基础性服务需求外，旅游、游戏、体育、直播等新的消费方式不断涌现。这些需求难以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方式完全满足，而零工经济模式则成为满足这些需求的主要选择。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人工智能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收入机会，从而为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提供了收入保障。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大规模地应用于个性化产品的开发和制造。例如，在传统工艺中，装饰品的个性化设计和制造需要优秀的设计师和技术高超的工艺人员紧密合作才能完成，需要消耗大量的劳动时间，属于奢侈品范畴；而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快速完成大量个性化设计，数控机床和 3D 打印技术则能实现产品的快速制造，使得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三）零工经济的发展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零工经济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下复兴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相应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依据大数据、大模型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部分替代人类智力劳动，成为全新的生产要素。相

① 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经济学家》2019 年第 6 期，第 5—14 页。

较于传统雇佣关系，零工经济所带来的新型就业形态，更能适应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这与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要素的要求高度契合。

首先，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生产范式和劳动形态的变化。纵观历史，我们不仅见证了技术进步替代人类劳动的演变过程，也见证了技术革命为人类创造新职业、新任务的持续过程。^①自工业革命以来，历次重大技术变革都催生了新的生产范式和劳动形态。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的大量应用使手工业减少，产业工人出现，生产资料与劳动所有权分离，资本家阶级成为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第二次工业革命，汽车、石油、化工等诸多行业的崛起，使大规模生产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关系逐渐规范化，劳动者保障制度逐步建立。随着劳动阶层收入的提高、股份制公司的兴起以及金融业的发展，私人资本逐渐向社会资本过渡。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的普及并未带来大规模失业，反而创造了 20 世纪后期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互联网为个体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催生了大量以个人和小微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创业现象。同时，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占比最大的产业，这为零工经济的复兴提供了土壤。据 Acemoglu 和 Restrepo 研究发现，在 1980—2015 年的 35 年间，新增的约 5 000 万个就业岗位中，约 60% 为新创造的职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服务性岗位。^②

其次，零工经济灵活的要素组合配置方式，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一，零工经济模式有助于高效利用创新资源。在传统雇佣关系下，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能抑制创新者的潜能；而零工经济下的新型合约关系，能够最大化地激发创新者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支撑。第二，更多元的要素组合方式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例如，以数据算法为依托的网约车服务，本质上是劳动者与自我拥有的劳动资料（网约车）的结合，并借助数字平台交付接送乘客服务。相比较于传统出租车模式，网约车司机既能利用网约车平台递增的激励政策提升工作强度，同时还能利用平台高效匹配提升服务频率。第三，零工模式能缩小研发团队规模，降低交易成本。在传统生产关系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动态博弈，其中隐藏着巨大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创新成本的转化和创新收益的分配，使得资本家与技术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合作与对立的复杂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低成本应用，创新者既可以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研发，降低研发成本和缩小团队规模，也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合约执行的监督与核算。

最后，零工经济模式有助于新产业的孵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新业态和新模式，并创造出大量的新职业和新岗位。据 2020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 2025 年，人工智能技术将创造 9 700 万个新岗位。然而，新兴产业尚处于孕育期，发展尚不成熟，产业规模相对较小，利润水平较低，且市场前景尚不明朗。同时，新兴产业的工作岗位多集中在初创公司、平台或个体户。因此，零工经济凭借其降低用工成本、减小用工风险、增强薪酬灵活性的优势，助力创业公司更好地应对激烈

① 洪永森、史九领：《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学术月刊》2024 年第 1 期，第 43—59 页。

② Acemoglu D, Restrepo P,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Vol.128, No.6, pp.2188—2244.

的市场竞争。^①

三、人工智能技术下零工经济中劳资关系的新特征

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资本和劳动者的关系为雇佣关系,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之一。恩格斯曾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②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然而,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物质承担者的生产资料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只是随着其物质形态的变化进行价值转移,真正创造价值的是劳动者。资本家作为资本拥有者,只是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参与的社会生产活动越多,涉及的价值创造越多,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也越多,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依托互联网平台产生的零工经济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营模式,它使数字时代再现计件工资,促进了资本的弹性积累,并加深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和分化能力。^⑤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使传统劳资关系发生了诸多新变化,改变了人们对劳资关系的传统认知。

(一) 零工经济下劳资关系更加复杂

新时代的零工经济作为共享经济在劳动用工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已打破企业传统的雇佣规则,成为一种基于使用权的新就业形态。平台作为零工经济的核心要素参与其中,使得劳资关系更加复杂。

首先,传统的以稳定、全职、终身为特性的正规就业以及与之配套的劳动福利保障制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劳动效率的提升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⑥在零工经济中,劳动者不再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被雇佣者,而是被视为具有完全劳动控制权的“微型企业家”。因此,雇佣者不再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规定的企业员工所应享有的福利待遇和劳动者权利,如带薪年假、五险一金以及解约赔偿金等。零工经济模式下的计件工资制度能够激发劳动者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激励,提高劳动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劳动报酬。然而,这也为收入极化埋下了隐患。

其次,在零工经济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雇佣关系中,劳动者只是作为劳动力的直接所有者,企业或雇主提供生产资料,并监督完成生产过程。在数字平台主导的零工经济中,无论是软件开发者、数据架构师还是网约车司机,大多数

① 魏国学:《灵活就业兴起的动因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2021年第8期,第22—30页。

② 魏国学:《灵活就业兴起的动因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2021年第8期,第22—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⑤ 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第5—14页。

⑥ Barbieri P,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 i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 Vol.25, No.6, pp.621—628.

劳动者本身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的统一。这既是社会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现实要求，也与马克思强调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逆发展趋势相契合。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所有权的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

最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降低了企业管理中因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交易成本。在传统的产业组合理论中，委托代理关系是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关系，也是交易费用产生的主要制度成本。由于监督关系的存在，企业家与劳动者处于既合作又对立的关系中。在零工经济中，平台通过实时数据网络和用户评分机制，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对劳动者工作情况的高效监督和激励，将用户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转移到平台和劳动者之间。

（二）零工经济缓解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关系

在马克思时代，机器的广泛应用提升了资本有机构成，生产活动趋向社会化、规模化。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以及社会发展历史逻辑，预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将不断激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现代国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缓解劳资矛盾：一是强化工会权利，增加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谈判筹码，维护劳动者权益；二是实施社会福利制度，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完善金融市场，为普通大众提供便捷、多元的资本积累途径。零工经济模式，作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发展推动的新型生产关系，在缓解劳资对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零工经济模式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对于从事技术密集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而言，一是可以在常规工作之余，利用空闲时间接受平台提供的灵活任务，增加额外收入；二是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发挥专业特长，在更大范围内寻求自由度和薪资水平更高的岗位。现阶段，这类劳动者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科研、法律、金融、财经、外贸等领域。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而言，由于企业不需要为劳动者提供社保、津贴、带薪休假等福利，且采用计件工资结算方式，劳动者自我监督，劳动效率普遍较高，因此零工经济劳动者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这也是当今工厂招工难，以及许多高校毕业生选择送快递等就业现象的原因之一。

其次，零工经济有助于稳定就业、提升生产率和改善工作体验。虽然从微观层面来看，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不稳定，但从宏观层面来看，零工经济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数字平台的发展为培训、直播带货、健身、网络游戏等行业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缓解了服务监督、地理位置以及售后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用工方和劳动者的匹配效率。此外，计件工资付酬模式有效杜绝了工资拖欠问题。^①

再次，零工经济的合约特征有助于降低劳资矛盾。零工经济中的合约关系通常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合约期限短，二是采用计件工资。基于平台的零工经济合约期限普遍较短，往往为单次计算，因此劳动供求双方很难积累矛盾。此外，平台作为交易双方的媒介，在提供信息和匹配劳动关系的同时，也承担着监督劳动者和解决双方纠纷的功能。短期合约对于劳动者而言存在摩擦性失业风险，因此零工经济劳动者的单位时间报酬通常较

① 魏国学：《灵活就业兴起的动因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2021年第8期，第22—30页。

高。此外,零工经济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获得平台订单的频率,劳动者对平台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这为平台监督劳动者、维护用户权益提供了保障。

最后,平台对劳动价值的剥削方式更为隐蔽。平台作为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中介,为交易提供了平台和渠道,节省了交易双方的时间、交通和信息成本。在零工经济中,平台成为最大的资本投资方和运营方,缓解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使双方在这种新型组合下均受益。在提供交易便利的同时,平台会向生产者收取一定费用,这是平台资本占有生产者剩余劳动价值的主要方式。平台通过三种方式使对劳动者的剥削更为隐蔽:一是平台给予劳动者随着离开的自由,由于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劳动者有随时离开平台的权利;二是平台价值来源于基于平台的交易数量,因此平台有强烈的意愿增加消费者和劳动者数量,通常会给予非黏性用户大量优惠和奖励;三是平台会给予平台长期使用者递增的奖励,为保障平台的高效运行,平台需要一定数量的黏性劳动者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因此通常会出台递增的奖励措施,使劳动者收入随着工作时长的增加而边际递增。

(三) 平台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零工经济中,平台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复杂。从就业形态来看,平台资本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同时,也极大地便利了生产者产品到资本的流转,使劳动者和消费者均受益。然而,平台资本并没有改变对劳动者的控制。凭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上的巨额投入,平台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监督和控制劳动者,使劳动者对其依附性更强;同时,平台利用信息优势,对用户进行歧视性定价,从而获取超额利润,这使得资本在劳资关系中占据更为主导地位。因此,对平台资本的批判性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首先,数字化平台作为信息资源的唯一获取渠道,具有垄断资本的特性。零工经济通常由三方协作完成: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者以及数字化平台。平台上的大量生产者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而数字化平台是连接用户与生产者的唯一纽带,因此提供信息的数字化平台成为零工经济中的核心要素。由于平台对信息的垄断,它能够利用垄断信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获取超额利润。此外,平台还凭借对客户信息的垄断权,不断榨取劳动者的超额剩余价值。^①大数据“杀熟”便是典型的利用信息垄断权榨取超额剩余价值的例子。平台利用老客户的黏性和信息不对称,对同一商品或服务收取不同价格,从而获取超额利润。例如,同一外卖平台对会员用户收取更高的配送费,同一打车平台对老用户收取更高的费用等。这也是学者对平台垄断行为的重要批判之一。

其次,平台资本不同于传统的垄断资本,具有其独特的特征。在传统垄断中,垄断企业能够通过控制产品的供给数量来制定垄断价格,从而获取垄断利润。平台垄断性质不同于传统垄断企业,表面上平台是价值的制定者,但由于平台与产品或服务供给者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合约关系,平台无法控制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数量。理论上,平台与劳动供给者之间的关系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供给关系,因此,对于平台而言,价格的生成只

① 任洲鸿、王月霞:《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滴滴司机与共享平台的劳动关系为例》,《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第5—12+113页。

是基于大数据确定的供需平衡价格，这与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并无不同。此外，对于大数据“杀熟”现象，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属于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的价格歧视。价格歧视在对价格不敏感者收取高于均衡价格的同时，能够对价格敏感者收取低于均衡的价格，从社会福利的视角来看，这是社会福利增加的表现。

最后，平台资本导致劳动退化。布雷弗曼在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时强调，“劳动本来是生产的主观要素，如今降到了从属地位，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要素”。^①随着科技革命和管理变革的推进，技术和管理者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导者，而劳动则不断退化和贬值。特别是以大数据、大模型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劳动者在零工经济平台这个新的“虚拟流水线”上进一步失去主动性，成为被数据算法摆布的“棋子”。表面上来看，零工平台的劳动者似乎拥有自主性和灵活性，但实际上算法却使劳动者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劳动强度。劳动者成为数字平台和算法的机械延伸，成为平台和算法所管理的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客观要素。^②

四、人工智能技术下零工经济中劳动者保障问题

虽然零工经济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有所助益，但零工经济劳动者却因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在与平台和企业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同时由于他们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低技能劳动者尤其需承担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的风险。^③相较于传统经济模式中的企业雇员，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被认定为独立承包商，无法享受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休假、五险一金以及解雇赔偿等权益。此外，我国社保体系不仅具有保障功能，还承担着再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任务，零工经济劳动者人数的增多无疑会给我国社保体系带来压力和冲击。本部分将重点分析零工经济发展对我国劳动者保障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

（一）零工经济发展对我国劳动者保护法律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

马克思曾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④零工经济的发展正在重塑社会生产模式、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这必然会对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冲击。^⑤按照当前我国法律对于雇工和非雇工的分类标准，零工经济劳动者若想享有灵活就业者的灵活性，就要放弃劳动法所赋予的合法权益，而若平台承认劳动者的合法地位，则必然牺牲劳动者在零工经济中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换言之，当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对劳动关系的界定已无法适应零工经济下的新实践，使劳动者在享有灵活工作模式与基本劳动权利保障之间面临两难选择，同时也使零工

①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朱基俊、吴忆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8页。

② 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第5—14页。

③ Aloisi A, “Commoditized Workers. 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bour Law Issues Arising from a Set of ‘On-Demand/ Gig Economy’ Platforms”, in *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16, No.3, pp.653—690.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⑤ 朱琪、刘红英：《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前沿进展与综述》，《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2期，第111—125+128页。

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面临挑战。

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为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和福利而提供的物质帮助措施的总称，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它旨在保障全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包括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实现。^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其中份额最大的部分。我国社保账户包括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其中个人账户由企事业单位员工个人缴纳，并成为其退休后领取相关待遇的主要依据；而统筹账户主要来源于灵活就业人员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这部分资金不归个人所有，退休后按照各地区标准统一发放。由于企业根据员工工资收入比例进行缴纳，因此统筹账户不仅具有保障功能，还起到了再分配的作用，有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因此，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再平衡功能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企业员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按照人社部数据，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为 10.66 亿人、2.44 亿人和 3.02 亿人。由于失业保险基本由企业为员工投保，不难发现，我国统筹账户中企业未缴纳部分的人数约占总参保人数的 1/4。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进入统筹账户，并按照地区标准发放。因此，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灵活就业人员大多只会按照最低标准进行缴纳。随着灵活就业人数比例的不断增加，企业缴纳的部分将逐渐减少。这一方面会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收入再平衡功能带来挑战，另一方面也会给国家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补充带来压力。

（二）零工经济给中低技能劳动者保障带来挑战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 年中国灵活用工行业市场调研分析报告》，我国灵活用工劳动者中，自由职业者占比 40.2%，非正规单位就业占比 23%，正规单位的非正式就业占比 20.1%，有稳定工作同时兼职的人群占比 16.7%。这些人群中，61.2% 为女性，56.7% 已婚已育。拥有 4 300 万用户、为 5.3 亿以上人次提供过服务的灵活用工服务平台青团社数据则显示，其劳动者 50% 为大学生，30% 为“蓝领”，15% 为“宝妈”，5% 为“白领”，其中“95 后”占比超过一半。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人瑞人才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企业灵活用工岗位中，低技能类劳动岗位企业如外卖员、快递员、保安、保洁等占比高达 56.53%。由以上数据不难发现，我国从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工作岗位不稳定；二是劳动者年龄年轻化；三是岗位要求低技能化。由于生活压力，依赖零工经济平台的低技能全职劳动者，可能面临工作日益不稳定和灵活工作的“去灵活化”的趋势。^②

零工经济的优势和活力，在于其灵活的用工方式，能够更高效地利用人力资本。对于企业而言，采用短期合约的灵活用工方式，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则获得了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低技能劳动者由于工作性质不稳定，在收入和身心方面承受一定压力。首先，企业或平台通常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因此他们无法享受平台或企业的福利计划，也不具备加入工会或进

① 陈华：《关于社会保障的几点认识》，《经济论坛》1998 年第 21 期，第 17 页。

② 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5 期，第 47—59 页。

行集体谈判的法律权利。这不仅消减了劳动者的福利和收入，还使他们在法律纠纷中处于弱势地位。当平台用户与劳动者发生纠纷时，平台往往倾向于牺牲劳动者利益以满足用户需求。其次，由于灵活就业者与企业或平台之间不存在固定劳动合同关系，因此企业或平台缺乏对这些人员进行持续培训的意愿。这不利于初进入职场的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提升能力和职业素养，可能使他们陷入低技能陷阱，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社会阶层固化。最后，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劳动收入不稳定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工作机会的可及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平台补贴和奖励规则频繁变更而导致的劳动所得减少。这意味着劳动者难以找到足够的与自身资质相符且报酬较高的任务，且任务连续性也难以保证。平台通过提供中介服务，从服务购买者支付给劳动者的费用中抽成获利。为促进自身资本积累，平台有压榨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倾向。^①例如，在线打车平台扩张期间，网约车司机曾获得丰厚的补贴和奖励，但当平台常驻司机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而用户增加有限时，平台对网约车司机的补贴金额急剧下降。同时，激烈的竞争使得单笔收入不断降低，而网约车司机因在网约车上的投入，难以迅速地更换工作，不得不通过增加工作时长来维持收入。

（三）零工经济下劳动者保障的市场手段与政策措施

市场是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手段。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和相关行业的完善，劳动者保障服务也随之兴起。首先，在服务保障方面，针对灵活就业的各类服务应运而生。例如，国内最大支付机构银联商务的广东分公司推出了灵活用工平台“好用工”，通过线上一体化服务方案，实现业务关系确定、资金安全及流程管控、税务及票据处理的一体化，满足业务流、资金流、发票流、合同流的四流合一要求，确保资金共管安全及财税合规。其次，在保险保障方面，针对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商业性保险日益丰富，既有针对意外情况的意外险，也有针对失业风险的失业险，如中国平安集团推出的平安企业宝平台，为灵活用工企业提供相关保险服务。为预防用户与劳动者之间的纠纷，平台为劳动者提供各种保险服务，如滴滴公司为网约车司机和乘客购买保险，代驾公司为代驾人员提供商业保险等。最后，在培训方面，平台或第三方专门培训机构也提供了相应服务。部分用工平台与劳动者签订用工协议，为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服务，作为回报，劳动者需在平台上提供一定时长的服务。同时，个人培训机构也不断涌现，提供计算机、机电、焊接等专业技能的培训，以及烘焙、保育等服务性技能的培训。针对灵活就业劳动者缺乏培训资金的问题，培训机构往往垫付培训费用，并从劳动者就业后的工资中分期扣除，同时作为劳动中介为劳动者推荐工作。此外，针对零工经济中的摩擦性失业，部分平台和互联网企业给予平台劳动者底薪安排。例如，网约车公司 T3 出行，只要网约车司机保证一定的在线时长，平台就给予司机一定的底薪补偿。

综上，政府应强化政策措施，保障零工经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第一，完善的社会保障是解除零工经济劳动者后顾之忧的重要途径。现有的社保体系依赖企业为员工缴纳的保险金来运作统筹账户，实现收入再分配和平衡收入差距。随着零工经济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其在社保中的比重提升，现有的社保体系难以实现这一功能。应更多采用财产税的方式来充实社保基金，实现收入平衡。第二，应给予低收入零工经济劳动者额外社

^① Lehdonvirta V, Kässi O, Hjorth I, et al., “The Global Platform Economy: A New Offshoring Institution Enabling Emerging-Economy Microproviders”, i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Vol.45, No.2, pp.567—599.

会保障，如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低收入零工群体的医疗、养老等；完善对零工经济劳动者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措施，给予零工经济劳动者同等的市民待遇。第三，应完善平台治理法规。网络平台是零工市场的重要载体。由于信息不对称，零工经济劳动者常常受到平台的不合理控制，“困在系统里”是这一特征的典型表现。因此，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规范网络平台行为是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重中之重是增强信息和过程管理的透明性，如提高平台算法使用方式的透明度，确保对工作条件进行人工监控，既促进零工群体体面劳动，又不损害网络平台利益，推动零工经济和零工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零工经济焕发新生并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为更多元化的生产组织关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零工经济作为一种灵活的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求，以及新技术对多样化生产组织形式的要求。同时，零工经济也有助于缓解新技术广泛应用对社会劳动需求结构造成的冲击。然而，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使得平台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资本剥削劳动的方式更加隐蔽。此外，由于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多被界定为独立承包商，他们难以享受传统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劳动福利和劳动保障。这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发力，为零工经济保驾护航，为零工经济劳动者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Flourishing Gig Economy und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I Zheng, LIU Tao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gig economy has regained vitality and exhibited new characteristics. The revival of the gig economy aligns with the basic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vides the driving for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ig economy, thereby enabling the emergence of more diversifie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gig economy has m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more complex. On one hand, the gig economy helps to reduce social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alleviate social conflict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creates the potential for platform exploitation of gig workers. In addition, as workers in the gig economy are generally defined as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ig economy also poses challenges to how to better protect workers' rights and achieve the income rebalancing fun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ig economy; labor relation; worker protection

(责任编辑：李 玲)